

No. 309

55

西昌专区会理县 下村彝族地区的巨大变化



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
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
1963年12月

前 言

西昌专区会理县下村彝族地区的巨大变化，是我组在1958年10—12月调查的。

这份材料原名“西昌专区会理县下村彝族地区概况”。内容为本区的自然概况、解放前的奴隶社会面貌及解放后的巨大变化。后将概况及旧社会面貌两部份提出编入“西昌专区彝族地区解放前社会情况调查资料彙集”中，已铅印成册。当下巨大变化这一部份进行复制。

这份材料反映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情況：

- (1) 下村彝族地区的解放；
- (2) 下村专区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；
- (3) 和平协商的民主改革运动；
- (4) 农业生产合作化。

这份材料由于调查时间较短，人数较少，因此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入。现将这些材料整理复制以供参考，不妥之处，请予指正。

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

四川民族调查组

1963年12月

FM38/4228

一下村土区的解放和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

(一下村土区的解放和解放初期的工作)

解放前，今下村土族地区的九个乡，除民坪、二板两乡分别为黑土奴隶主蔡茂发、吴万富二人统治之外，其余各乡均为国民党反动派的“全江中游守备司令”苏绍章所统治。苏是继军阀邓秀廷残酷镇压土族人民之后的又一个“土皇帝”，他阴险的惯用“以土制土”的手段，以便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，其所用的具体办法是：

1. 所谓“安抚”政策，即是吸取邓秀廷的“经验”，全力扶植被击败的土族头人，收纳他们在部下当兵效劳，同时鼓励土区大男种植鸦片，苏家便从中抽取“厘金”，所收鸦片，最高年达5万多两，然后转运成都、昆明等地高价出售，换回大男枪支子弹，以充实自己的实力，苏绍章并利用土族头人在土区收取“厘金”，进行敲诈勒索，很多头人也就因此富裕起来，而更效忠于苏绍章。

2. 以挑拨离间伎俩加强土族内部的冤家纠纷，使其互相残杀，彼此削弱，也使坐收渔人之利。

1950年2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，从云南向会理进军，迅速的击溃了苏绍章匪军，胡宗南的“华南纵队”也闻风而逃，会理县城迅速解放，苏绍章扣押土监。

由于解放军进军的迅速，政治工作尚未跟上，民族工作也未能开展，苏绍章在监中暗中进行对外联系，造谣破坏，支供所屎爪牙制造混乱说：“共产党是水，苏家是石头”“解放军要走了，苏军又要回来了”，加上少数反动分子煽动叛乱，全县各地均发生了土匪抢粮事件，因此土族上层头人，有的对党的政策发生怀疑，猫乡的李成康、槽元乡的陆阿高、小里乡的付成华等黑土奴隶主都参加叛乱，残匪苏汉宾盘据在土区的六华乡，组织人马全

图围攻解放军，这就影响到立族地区的社会治安。围剿苏汉宾的工作，持续半年之久，大小战斗几十次。解放军对残匪一方面进行军事打击，另一方面进行政治争取。终于在1951年1月活捉苏汉宾，彻底消灭了残匪。

从1950年7月，中共会理县委，便在下村举办“训练班”，大规模的开展争取立族头人的工作，宣传党的平等、团结的民族政策，并说明“既往不咎”，以分化立族上及人士，积极团结进步的，争取中立的，通过进步头人继续争取落后的，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。由于贯彻了这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，立族上及头人，逐渐的了解民族政策，向党靠拢，有的还积极参加了剿匪工作。在1951年的全县评模授奖大会上，很多上及头人剿匪有功获得奖旗奖状。计获奖旗的15人，得奖状的50多人，获其他奖品者100人。立族头人蔡长发、李泽申、马成吉、马成洪、陆阿角等，都受到奖励，从此立族地区的社会秩序空前安定，为以后进一步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

1951年1月以后，为了配合汉区土改镇反工作，巩固立区剿匪工作成果，会理县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，后又组成民族民主联合政府，其中刘成康、蔡长发、马成吉、付正元、陆应中、陆阿角、红头发、李泽申、马成洪、吴万富、吴万云、赫子成、陆子成等主要头人，当选为政府委员和民委会委员。1951年5月，在下村附近的盖门地区，召开了第七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，一致通过了政府委员29人，其中汉族17人，立族10人，回族2人。至此，成立了第七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。当时参加成立大会的有立族人民200多人，各乡头人都出席大会，共饮血酒，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。大会上通过了工作报告，宣传了民族政策，订立了团结公约，这就有力的减轻了民族隔阂，增进了民族团结。

1952年3月以后，六华、山地等乡陸續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。立族人民，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，初步

建立了自己的政权，获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。

解放前家支之间的冤家纠纷和冤家械斗，使土族人民痛苦不堪。这本是奴隶主阶级为了掠夺娃子、土地和其他财物，经常藉口“报仇”，逼迫土族人民进行械斗，造成惨重的伤亡，并严重的破坏了生产。六华乡六家村的马成福和二板房乡的吴万银是几代人的冤家，长期未能和解。长坪乡的蔡长发和二板房乡的吴万富，同是河俄家的弟兄，因争夺一条水沟而成了冤家。1940年邓秀廷进剿会理立区的时候，又乘机进行挑拨离间，以加深他们的仇恨，此后，蔡、吴二人各拥200多枪枝，相互进攻，持续20年，死伤数十人。

解放以后，民族之间的团结加强，民族内部的纠纷仍旧，这不利于土族人民，更妨害了生产的发展。根据省委指示“不许打冤家”的原则，在团结的前提下，用协商的方法，本“旧案谅解，新案调解”的精神，由县人民政府，大力的进行调解冤家纠纷。

解放前，全区共有冤家纠纷600多件，到1952年末调解了较大纠纷200多件，冤家械斗不再进行。过去不能见面的仇人，这时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共商大事。蔡长发与吴万富也言归于好。他们见面时深为感动的说：“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，我们的冤家那能和解，我们两人可能都死了，那能有今天的欢聚”，黑土马崇发回忆过去的痛苦生活说：“从前我们是抱枪睡觉，那能安眠！现在我们的枪放在墙角里都生锈了，今后再不会打冤家了”。黑土杨万明更有进一步的认识说：“过去那些怪事，都是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，今后我们再不团结，不听人民政府的话，就对不起政府了。”

通过冤家纠纷的调解，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，都进一步的加强，土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空前提高，党和政府及时的引导人民发展生产。

由于解放前立区生产水平的低下和上等地都用以种植鸦片，

粮食总产量更加减少，各族人民的生活更为困难。解放后，党和人民政府立即发现缺粮和缺衣的严重情况，立即开展救济工作。棉衣、棉布、粮食、食盐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，大量的运进专区，无偿的发放给各族人民。并给各族人民以无息贷款，使其能尽量的购买生产和生活用品。据1953年4月统计，全区发的救济口粮多达10万斤，又大量的发放了寒衣、农具、种籽、肥料和耕畜。另外又贷款一亿多元，贷粮一万多斤。据第七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952年冬的统计，已给各族人民发宽布500丈、寒衣600套。仅六华一乡便有356人共获得宽布244丈，仅六华乡六家村21户的76个各族人民中，在1954年以前便发放了救济米836斤，寒衣布20丈。各种无偿农具19件，人民币3000元。六华乡1953年统计，仅救济款便支出14,000元。各族人民，共产生活上的困难初步解决，生产积极性更加提高。政府为了使各族人民能更好地生产，又教育和帮助他们组织起来，成立生产小组，生产小组的生产获得丰收，劳动积极者又评为模范，获得奖励，这有力的带动了其他各族人民，也组织了换工互助组，以集体的力量搞好生产。从而专区的生产普遍的发展，人民生活也随之改善，许多过去吃不到盐巴，穿不上布的情况都改变了，不仅有吃有穿，而且由于国营、合作社营的商业机构，在专区逐步设置，廉价的供应生产生活用品，照价收购土特产品，过去不值一钱的土产，现在可以换回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，各族人民喜出望外，购买力提高，生活也更加好起来。

为了进一步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文化水平，增进身体健康，多方劝阻各族人民种植和吸食鸦片，并自解放开始，便派医疗卫生工作人员为各族人民预防和治理疾病，逐步的改变了各族人民过去缺医少药求鬼神治病的落后情况。同时政府拨款兴建学校，1953年建成民族小学四所，吸收各族子弟入学念书，供给食宿，有两所是免缴一切费用。到1953年底更发展为七所，在校学生472

人，其中有302人享受全公费待遇。

从三区解放开始，各族人民就开始体会到“共产党和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”。首先使他们接触到的是解放军。解放军的优良品质，处处从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，英勇的消灭土匪，使各族人民安居乐业。对穷困的各族人民还解衣推食，以解救他们的饥寒，并为他们修筑道路桥梁，减轻了各族人民长期以来交通上的危难和痛苦。医务人员不避艰辛，爬山涉水的为各族人民治疗疾病，把许多病人从死亡的边缘救活起来。国家工作干部，遵照党的指示，从人力物力上，解决了各族人民生产生活中的许多困难，从而使他们能发展生产，改善生活。国家贸易机构的工作人员，交易公平，廉价供应生产生活用品，照价收购了他们过去认为无用的土产，使他们增加了收入，购买力提高。祖先没有享受过的玻璃、胶鞋、搪瓷用品，他们都能随意购买。这种生动的现实，深深的印入各族人民的脑中，更使他们感动的，是处处享受到民族平等的待遇。各族人民的代表，到全国各大城市去参观，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，党和国家领导人，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。本地本区的各级民族民主联合政府，有联系人民群众的头人代表，根据各族人民的意愿，为本民族办事。各级民族学校为各族人民教育青年，培养干部，各族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、政治觉悟日益提高，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(二)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——各族人民当家作主。

由于党坚决的认定，只有使各族人民按照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当家作主，才能迅速的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歧视，不断的增进民族间的信任和团结，才能充分发挥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，才能迅速的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，使其更快的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，逐步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。

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，在各族人民群众中，进行了长期的

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，受到了各族人民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拥护。并迫切要求党和政府帮助各族人民，实行区域自治，实现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。党和政府遵循着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”，依照广大各族人民和与人民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意愿，积极的、适时的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。把会理县民族聚居的六华、长坪、二板、槽元、黄柏、山地、猫儿、小里等，齐合等九个民族自治乡，联合成为会理县下村民族自治区（以后，根据宪法规定，自治区名称不再保留，所隶各乡仍为民族自治乡）。区人民委员会设在六华乡所隶的下村地方。1954年1月13日，下村民族自治区正式成立。在自治区所在地召开了各族各界代表会议，参加大会的有各族代表400多名，另有各族人民群众1000多人。选出了自治区政府委员23人，其中民族19人，占委员总数的82.6%，汉族委员4人。主席一人，付主席六人，其中有五人足之族。较有威望的头人如蔡长友、吴万富、李泽申、刘德银、马成吉等都当选为付主席或区政府委员。出席会议的代表，还听取了三年来民族工作的总结报告，关于自治区成立的几个问题的报告，自治区今后工作的报告。代表们经过充分讨论后，对上述问题，作了相应的决议。

1954年1月13日这一天，是会理县下村区各族人民难忘的日子。当天会场上张灯结彩，人心振奋，边炮雷鸣，音乐齐奏。许多单位的代表向自治区政府委员们献旗、献花。会上县委领导同志，作了重要指示，代表来宾都有讲话。政府委员们也纷纷表示了要为各族人民办好事情的决心。历时四个钟头的自治区成立庆祝大会后，又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歌午和电影晚会。由于领导上的重视，会理县还请有关部门派人前来服务，如医院的医生、贸易公司的售货员、广播站的广播员、各校学生代表、民警等都前来参加大会。中共西昌地委还特派电影放映队前来祝贺。这是会理县下村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，有史以来第一次盛况空前的聚会。

这次会议，是一次胜利的大会，也是一次团结的大会。会上全面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，各族人民感动地说：“毛主席像爹娘关心儿女一样，无微不至。”各族人民这时也回忆起了过去所受的痛苦，不断的进行新旧对比。他们说越想到过去的痛苦，就越感到今天祖国大家庭的温暖，就越能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，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意义。从而政治思想觉悟也大大提高。出身于奴隶的土族代表沙万发说：“从自治区成立的事实，我深刻的体会到各族人民是真正作了主人”。蔡长发也说：“不用说我，世人都喜欢成立自治区”。这次会议，处处都体现着团结。在代表会议进行中，还调解了较大的冤家纠纷12件。有许多原是冤家的代表，怀着疑虑的心情来参加大会，深恐在会上被冤家陷害。结果经政府一调解，多年的冤家和解了，欢聚一堂，共商大事。

从此下村区的各族人民，有了自己的政权。虽然在政府委员中劳动人民还是少数，但这政权毕竟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。全面贯彻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政权组织。这一政权的建立，标志着几千年来各族人民受压迫受歧视的情况已经改变，这是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在会理自治区的全面胜利。

区域自治政权机关建立以后，各项工作进一步广泛深入的开展。虽然土区在1950年2月就已经解放，但干部能够深入群众去开展工作，是1952年以后的事。这一方面由于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，各族人民对于党的民族政策，一时还不能了解和信任，另一方面土族上层的黑头人从中梗阻，造谣破坏，如统治二板房乡的吴万富，他自视聪明过人，胜过“能格斯惹”（孟获），一贯投机取巧，玩弄两面手法。在1940年邓秀廷围剿会理土区的时候，他首先向邓投诚，并为邓带路进攻蔡长发的老家长坪乡，于是邓军对土区进行残酷的烧杀抢掠，对二板房不曾触动。吴万富借此向他统治的各族人民表示，这是他的“明智”。因此有“小神仙”

之称。在会理解放前夕，他曾夸过海口，“二板房是小台湾”。1950年2月，会理城解放以后，各族人民中纷纷传说着解放军的优良品质、模范事迹，共产党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。4月，吴万富便亲赴会理城，向政府表示他衷心拥护人民政府，遵守一切政策法规，但是他刚一离开会理城便说：“你有你的会理城，我有我的二板房！”从此坐山不动，凡事阳奉阴违，并造谣破坏说：“共产党是水，吴家里立是石头”，又说：“共产党的政策是先甜后苦，至多只有五年天下”等，并多方威胁各族人民说：“谁接近工作干部要重惩”。这样便给民族工作的开展，带来很大的困难。一直到1952年才深入到二板房乡，但吴万富仍然凡事暗中破坏，甚至在汉区土改时他还隐藏土匪特务，与人民作对。二板房乡要建立乡政府时，他同吴家的人竟公开反对。由于对吴万富耐心的进行说服教育并仔细的交待政策，揭破谣言，最后他才被迫同意建立乡政府。

虽然我们仁至义尽的进行争取团结，但反动的统治阶级，总是不会主动的退出历史舞台，这反映在以后民主改革的时候，吴万富等还企各进行叛乱，与人民为敌到底。

从1954年自治区成立以后，工作较顺利的进行，一方面继续做好上及统战工作，另方面对民族劳动人民深入的开展工作了。这时除了继续清查匪特，巩固社会治安、调解冤家纠纷、增强民族内部团结以外，还着重地进行：(1)对上及头人进行教育；(2)深入的发动群众，启发提高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；(3)进一步领导和组织生产，并通过生产及其他工作去教育和发动群众。

区乡分头召开头人和群众会议，讨论改进生产的问题，全专区共组织生产小组37个，开始改进耕作技术，部分农户实行点播、选种，有的还改坡地为梯地，增施肥料并进行田间管理，开始克服了“刀耕火种”广种薄收的情况。但1954年自然灾害严重，农作物减产，有200户人口粮不足，仍须政府救济。一年共拨救济

款4500元，农具贷款852元，种籽耕畜贷款395元。又拨发无偿农具5037件。贸易部门还供应了农具5000件及价值25000元的生产生活用品，另收购了价值2000元的土特产品。通过这一系列工作，进一步解决了各族人民生产上的困难，思想觉悟有所提高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思想也有较大的波动，见人民政府严禁种植鸦片，便向干部探询那年“进行民主改革”？土反头人疑虑很重，有不同的反映。有的说：“只要不斗争黑土，分土地没关系”。有的存心要叛乱。如吴万富说：“我绝不像汉族地主那样软弱，到那时候杀得一个是本，杀得两个是利，要这样死了才值得”。而各族人民，便强烈的要求改革，见到干部便问：“什么时候才天亮？”同时进行逃亡，破坏农具，消极怠工、打骂黑土等斗争。1954年5月17日，吴万富、陆金山的娃子，一日之内，逃走了39人。在此同时有的黑土奴隶主打骂和虐杀娃子的事件，也越来越多，对干部的行动也加以监视。因此1954—1955年之间，对自治区人民的工作是更为复杂。但是这时，多数各族人民，对于民主改革，还缺乏足够的认识，也还缺乏可靠的基础和应有的力量。

自治区成立以后，各族中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干部，是在迅速的成长。解放以后，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培养民族干部。通过在实际工作中锻炼，举办训练班和送民族小学，西昌民干校，成都西南民院、北京中央民院等学校进行培养。1952年，有民族干部16人，其中任县副县长、科长、区长者5人，一般干部11人。1955年，民族干部增为51人，其中出身于娃子的23人，占民族干部总数的45.88%。群众对他们很信任，这为自治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由于自治区工作的深入开展，群众觉悟进一步提高，为民主改革创造了条件。1955年，合理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为民主改革创造条件，并重点实验民改。首先是积极深入的开展群众工作，争取进步力量，并大力培养民族干部，积极开展建党建团的工作。

同时继续加强对上层的统战工作，以及对他们的教育改造。

土族上层见土族人民的觉悟迅速提高，采取种种卑鄙手段以打击和麻痹土族人民，一方面对干部的活动进行监视破坏，虐杀进步的娃子，另方面对一些娃子施以小恩小惠进行收买，搞充乡残酷的世家奴隶主，对瓜西娃子肖巴，竟破天荒的为他缝制新衣服给吃酒肉米饭，要求他不要听干部的话，并造谣威脅说：“共产党是骗你去杀来熬死机油的”，但是觉悟了的土族人民是不中他们这些毒计的，却将黑土奴隶主的一系列思想言行，及时的向干部反映，奴隶主阶级威脅利诱遭到失败之后，便进行血腥镇压，吴万富杀害了将要逃走的娃子；陆假贾枪杀了在逃亡中的娃子七人；陆日依处死了急工的蒙柱。奴隶主阶级越残暴，土族人民反抗奴隶制的斗争也愈激烈，这时除了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以外，还通过召开“土族劳动人民代表会议”、“土族劳动模范积极分子训练班”等组织对土族人民进行系统的阶级教育，土族人民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，终于在1956年实行了伟大的民主改革，土族人民彻底翻身，作了新社会的主人，进一步掌握了自治区的政权。

下村土族自治区，在1958年10月，基本实现了自治机关民族化，全自治区共有机关干部63名，其中土族是38人，占全区干部总数的60.32%，这些干部都是德才兼备的，63名干部中有党员29人，团员8人，共37人，为全体干部总数的58.73%，从自治区干部的家庭出身看，90%以上，都是奴隶群众和劳动人民，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在解放初期，政府机关干部中90%以上都是上层头人的情况，安分守法，积极工作的上层头人，政府也作了适当的安置，有的还担负了重要的工作，如作付子员、付县长、付区长等，在会理县政治协商会议共有委员54名，其中有45人都是土族的上层头人，45人中有11人是县人委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，并有一人是付县长兼政协付主席。

在乡社基层干部中，更完全为立族劳动人民所掌握。1958年10月，全区共有农业社149个，各社的正付社长，社主任、社委员、会计等共有792人，其中736人是立族，占社干部总数的92.92%。其中有女社长67人，女社务委员156人，女会计10人，共计233人，为合作社立族干部736人的29.42%。

在乡社基层中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也在迅速的成长。据1958年10月统计，全区共有农村党员71人，团员231人，党团员占总人口数的0.468%。他们在各项运动中，都起着积极带头和模范的作用。

劳动人民的武装也发展起来，1957年统计，全区有民族自卫武装1528人，持长短枪563枝，有子弹2587发，这些民兵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，是人民忠实的自卫战士。

民主改革以前，受压迫最重，受苦最深的是立族妇女。在民主改革以后，她们结束了政治上无权的状态，破天荒的有了自己的组织，成立了下村立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，有妇女委员十七人，领导九个民族乡的立族妇女作了很多工作，为发展本民族的经济文化，消灭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而继续努力。

下村自治区自治政权建立以后，立族人民当家作主，增进了民族团结。立族人民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，主动精神和革命积极性日益显露出来。随着民族隔阂的消除，立族内部一度被民族隔阂的烟幕所掩盖了的阶级矛盾，日益明显和更加不可调和。91%以上的奴隶群众和劳动人民要求实行民主改革，废除奴隶制度。

二、和平协商的民主改革运动

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各族人民，渴望着自由幸福的新生活。但是残暴的奴隶制度尚未废除，奴隶群众的身上还拖着沉重的锁链，束缚着他们的手脚，这就严重的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。

(一) 各族人民迫切的要求实行民主改革

实行民主改革，彻底摧毁奴隶制度，是各族人民摆脱贫困、落后，全面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事业，在自治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。这也是各族人民获得繁荣发展的唯一道路，所以各族人民觉悟提高之后，便更加坚决的进行斗争，迫切的要求实行民主改革。

黑土奴隶主阶级，在解放以前是极端残暴的压迫剥削和虐杀奴隶群众及各族人民，解放以后，也并未因为党的启发教育，而减轻其剥削与压迫。在1945年黄柏、槽围、二板房三乡的黑土奴隶主共杀害奴隶60多人，猫乡乡的奴隶主将不驯服的奴隶推下悬崖摔死，并说：“用枪打死，还可惜了子弹！”在解放以后的1953年，槽围乡的一个奴隶主，因奴隶与他发生争吵，立即将这个奴隶枪杀。另一个奴隶在劳动时不慎碰着了这个奴隶主的妻子，也立即被击毙。小里箐乡一个奴隶因病不能劳动，被奴隶主打死。二板房乡的奴隶主将逃亡的奴隶枪杀，毒打奴隶，更是奴隶主经常的事。六箐乡炭山村奴隶主安顺发的奴隶勒博，在解放前后，被奴隶主毒打过38次，有时还要受其他种种毒刑，奴隶主所用毒刑的种类之多，是不胜枚举的。常用的有：捆着抛在水沟里鞭打，全身脱光捆刺麻鞭打、用石头、棍棒乱击，用烧红的火钳烫身体等。常用的杀死奴隶的方法是：枪杀、刀砍、放毒、推下悬崖活埋、五牛分屍等。奴隶群众，忍受不了饥寒和酷刑，常用的斗争方式是逃亡、自杀或消极怠工、破坏工具等。后来部分地

区也进行了集体的武装斗争。解放以前这些斗争，一般是分散进行。解放以后，开始有组织自觉的斗争。如小黑箐乡奴隶主耕地时以少数人“放哨”，多数奴隶主便晒太阳睡觉。二板房乡奴隶主集体逃亡，一次相约39人同逃。有的女瓜西无法逃亡时，便集体进行自杀。1953年6月，六华乡奴隶主安相忠家三个女瓜西逃到森林共同服毒未死，有一人被救活，其余二人后来共同吊死在一根绳子上。

解放以后的奴隶群众，逐渐的由消极的逃亡自杀，转为积极的反抗斗争。打骂奴隶主、毁坏奴隶主的房屋财产，抗纳贡物、聚众示威等行动，不断的出现。1951年，小黑箐乡付兴华的瓜西，放火烧毁了付家的新房屋和内部贮存的粮食十多石。1953年，山地乡和六华乡的娃子，当众打骂黑土奴隶主。1955年，六华乡奴隶主马成吉的娃子马志和等三家，拒绝向奴隶主送猪头，洒肉等年贡。他说：“汉区已经土改了，我们就不送礼了”，奴隶主派人把他抓去，他理直气壮的质问奴隶主：“你们找我来干啥？”说完转身就走。1951年正值汉区土改时，小黑箐乡吐勒户学中召集200多娃子开会商议，如何对付奴隶主。1954年，小黑箐乡奴隶主刘六六逼死瓜西，这瓜西家中人约同娃子四五十人进行示威后，进会理城向人民政府告状。

这一系列的斗争情况，说明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，已经尖锐得不可以调和了。民族人民再不能在奴隶制度下照旧的生活下去。他们从汉族人民的翻身解放，早已认识到共产党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。他们对于党寄予无限的希望和最大的信任。猫乡年老的付大妈说：“晓得那天才土改？我这老命要留着过两天好日子”。黄柏箐乡蔡老妈祈祷说：“菩萨快点来，毛主席快点实行土改，快点把我们民族人民解放出来”，她这种情况，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族人民的心意。1955年，黄柏箐蔡老妈被奴隶主陆金安打了一顿，她当面对奴隶主说：“你不要歪！我们人民要

翻身了，最多再拿几年给你歪！”这反映了各族人民急待推翻奴隶主的统治，改革土地制度，民主改革是他们一致的意愿。党正确的适时的领导各族人民进行了这一工作。

(二)和平协商的民主改革工作的进行

要保留奴隶制度，各族人民永远也不能达到繁荣发展的目的，但要取得推翻奴隶制度的胜利，各族人民必须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民主改革。

在汉区进行土改以后，部分奴隶主也预感到民族地区将来一定要实行改革的，对此问题极为关心，发出了许多议论。大多数奴隶主是不愿意甚至反对改革的。

二枚房乡的吴万富说：“我老了，是该死的人了，但是我绝不像汉族地主那样软弱！”

长坪乡蔡长发说：“民主改革，在汉族住的平坝里才有搞头”。

他们预感到民主改革，将会彻底推翻他们的统治，因此对改革抱着极大反感，一面表示至死不屈，一面对群众又施以威脅恐吓。

另一部分奴隶主，知道民政是不可避免的，便提出了一些条件，要求有条件的进行改革，如陆应中、陆子成等说：“如果真正只是分一点土地，那都没有什么关系，第一件就是怕将来要斗争”。

马成吉说：“要像汉族地主那样整吗！宁顾自己早点找条路……到那时要斗争，就各人准备一颗子弹，要不就是吃毒药”。

有的奴隶主企各转移各族人民的注意，故意把改革说得与自己无类似的。

有部分黑奴奴隶主的抵触反抗情绪，也见诸于行动之中。首先是娃娃子严加控制，禁止吐勒、蒙柱的小孩上学念书。显说：“他们读书有了更大的本领，将来我的子孙如何管得了他们！”甚至于限制吐勒赶集，是亲戚家，进城或开会与汉人交往，避免

接受新思想，力使各族人民永远处于愚昧的境地。其次是挑拨离间党和各族群众的关系。猫乡奴隶主，在娃子有困难向他们借贷时说：“你们去找人民政府想办法”。但同时他又向乡人民政府说：“家：都望着政府还行”！他是期望政府不给各族人民解决困难，以便于他施小恩小惠进行拉拢。再其次就是分散财物，大吃大喝。猫乡奴隶主付正海经常大摆酒宴说：“有点吃点，吃一天补一天”。再一种情况就是拒不同人民政府和工作干部见面，如吴万富、陆日依等，不下山开会，怕被扣押，逼迫缴枪，以后改革时被斗争。

民主改革是一场艰巨复杂的阶级斗争，各族人民有充分的准备。

为了充分发动群众，县、区、乡、村分别召开了劳动人民代表会议，每三至五户选出一个代表出席会议。会上会后都以大量的事实，揭露奴隶主对各族人民的卅多种剥削项目，卅多种刑法，卅多种无偿劳役，和许多不合理的制度。在县上召开了两次劳动人民代表大会。在1956年2月召开的一次大会上，有673名代表申诉他们的直系亲属被奴隶主杀害的310人，被虐待或残废的134人，被出卖和陪嫁的508人，被勒索的财物仅牛羊即达2423隻。许多代表回忆起祖辈所受的痛苦，纷纷争取上台进行控诉。掀起了全县性的“背靠背”的诉苦运动。因为这是劳动人民代表会议，奴隶主没有出席，各族人民能畅所欲言的倾吐苦水。在诉苦运动中，又利用积极分子，组织互相串连启发。包干发动，小里管，猫乡做到了无空白点、空白人，人人都受到了教育。各族人民懂得了仇恨奴隶制度和整个的奴隶主阶级，觉悟大大提高。

群众展开诉苦运动时，奴隶主感到非常不安，于是使出种种卑鄙手段，装穷、叫苦、威胁利诱无所不为，有的企求收买群众，有的购置枪弹，准备抵抗，有的奴隶主一户人便囤积枪支十多枝，准备公开叛乱。